

她自己面对镜头录制课程，也带动专家大咖上课，这些课程面向全国医学生开放，为医学生补上人文课。她还常常与公众谈家庭教育、谈如何给孩子成长空间。

闻玉梅院士父母都是留美医学专家，母亲桂质良是中国最早留美归国的精神病学学者，她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开创性地提出：关注儿童精神健康关乎国家未来。

2021年1月28日，《新民周刊》对闻玉梅院士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专访，这次“无目的”的采访中，闻院士谈起了自己的母亲，谈起了与先生如何互相支持，谈起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该给孩子怎样的成长空间……作为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，闻玉梅院士所持的科研观和教育观，值得我们细细思考。

女中里的个性学生

《新民周刊》：谈谈您小时候吧，您成绩那么好，是怎么做到的？

闻玉梅：我和我的母亲都是上海市三女中毕业的，我们那时候的同学都非常活跃。前些年有人问我是不是应该保持女中，是不是男女混校更好。我认为可以保留女校，但不需要太多。

我小时候英文特别好，当时市三女中是教会学校，除了中文课用中文教，其他的地理、生物、历史都是外国老师。学校还比较注意培养你的礼仪、你的态度和与人交往的方式。

学校里其实是很自由的。我们喜欢跟老师开玩笑，最喜欢跟外国老师开玩笑。英文里证明什么叫

右图：年轻时的闻玉梅院士与母亲桂质良教授（右）。



proof，学生问年轻的女老师，有没有kissproof，女老师脸通红，笑死了，孩子们会很闹。

毕业后我的同学从事的专业真是五花八门，有搞古生物学的，有进了复旦新闻系的，有搞幼儿教育的，有成了音乐家的。朗朗的启蒙老师叫朱雅芬，也是我同学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学医是您的第一选择吗？还是家长的意愿？

闻玉梅：高中毕业我17岁，我妈妈充分尊重我的意愿。我说我第一个想学医，学医我只填上海医学院（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），其他学校不去的；第二个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如果新闻系考不取我就上复旦外文系，因为我外文好。

为什么我一定要上上海医学院呢，因为我中学已经是教会办的学校了，大学一定要上中国人自己办

的大学。

我们当时听到很多宣传，觉得中国人自己的大学非常不容易。抗战时期上海医学院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在沦陷区，一部分在重庆歌乐山。到重庆的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们一律不开业，他们开业可以赚很多钱，但上海医学院规定教授们只在医院里看公费的门诊，而且都是特别有名的教授，比如颜福庆。这种爱国之心是潜移默化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当时您家庭条件很艰苦，在学校里是一种什么感受？

闻玉梅：当时的女中相当于贵族学校，永安公司经理的女儿啊等等都是同学。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有一些压力的，因为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，我妈妈带着我和姐姐，又是战乱，经济很困难。我们家没有钱，

为什么我一定要上上海医学院呢，因为我中学已经是教会办的学校了，大学一定要上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。